

山东海岛考古新突破:大钦岛东村遗址发现打制石器及大汶口聚落制玉线索

山东海岛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海陆互动”的枢纽,是人类适应海洋、开展海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研究文明起源、海陆关系与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珍贵空间。山东沿海分布着500多个岛屿,其中规模最大的的是庙岛群岛。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扼守渤海“咽喉”,北望辽宁老铁山角,南临山东蓬莱。

工作缘起

山东地区的海岛考古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严文明先生带队,北京大学联合烟台地区文管组在庙岛群岛各个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调查了南北长山岛、大黑山岛、砣矶岛、大钦岛和南北隍城岛上的11处古遗址,对海岛史前文化的分布和发展序列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年至1987年,北京大学连续五次对大黑山岛北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岳石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紫荆山一期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198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发掘砣矶岛大口遗址,首次解决了胶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问题。1982年秋,北京大学、烟台地区文管会及长岛县博物馆联合试掘了北隍城岛山前遗址,发现了庙岛群岛北部岛屿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比群岛南部岛屿更为密切。1982年、1983年北京大学对北长山岛珍珠门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商代的东夷文化特征。

考古工作者在胶东半岛的烟台、长岛、栖霞、牟平、莱阳等市县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基本建立了白石村一期—邱家庄一期—紫荆山一期—北庄二期—杨家圈一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芝水二期—珍珠门文化—南黄庄的发展序列。尤其是庙岛群岛的考古工作,为构建考古学序列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资料,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框架性的支持。

本次海岛考古工作通过对海岛古遗址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揭示海岛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独特作用,系统梳理沿海岛屿人类活动轨迹与文化序列,深化对海洋文明起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全面提取遗址信息,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重建古代海陆生态系统下的人类生存模式,揭示海岛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与陆地的互动关系,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关键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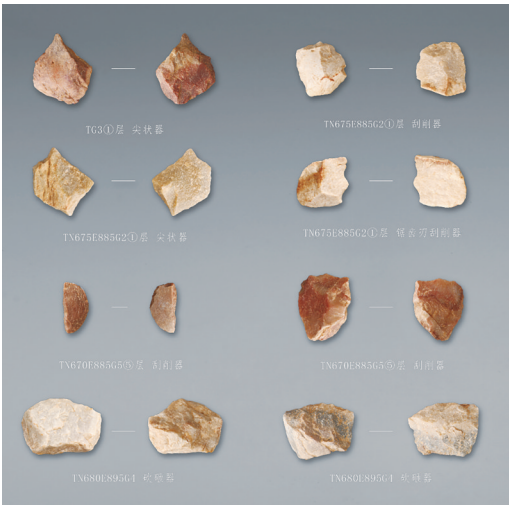
工作概况

地理区位 东村遗址位于烟台市长岛综合试验区大钦岛东村南100米处,东距海岸线400米,属小地形盆地南缘高台地,地势南高北低。遗址被选定为山东海岛考古的重点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首先,东村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胶东半岛邱家庄一期和辽东半岛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特征,还发现有白石村一期的零星陶片,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及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庙岛群岛呈南北向串珠状分布于胶辽半岛之间,是早期航海“循海岸水行”的天然依托,也是盛冰期海平面下降时的连续陆桥。东村遗址所处的大钦岛,位于庙岛群岛北端,是南北交通线路的正中心、对于研究新石器以来跨海交通和旧石器人群跨海迁徙与资源利用具有关键性作用。此外,遗址处于山脉北坡,属群岛的西北风迎风坡,受西北气流自亚洲内陆搬运及地方风系吹动渤海底和黄海沿岸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丰厚的黄土层,是人类定居、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

工作方法 为进一步明确遗址的文化属性,探究海岛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8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烟台市博物馆和长岛综合试验区博物



出土刻划陶片



出土打制石器



出土陶鼎(残)

馆对该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针对东村遗址本身保存较差、文化层较薄、黄沙易坍塌的特殊性,此次考古工作采取了加宽隔梁、全面揭露的适用性措施。考古队对遗址周边进行全面普查和勘探,研究海岛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布局;对遗址周围黄土进行了取样,了解遗址形成原因及环境信息,探寻遗址先民如何利用海洋资源、适应海洋环境,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展多学科协作,联合多家机构对出土人骨、动物骨骼等进行测年;开展土壤微形态、磁化率、粒度等一系列环境考古研究。东村遗址作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交流的重要节点,为串联海岛及沿海交流网络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着力点。

主要收获

本次发掘的文化遗存主要分为两个时段,早期遗存为大量的打制石器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遗存为大汶口文化聚落,遗迹以房址、柱坑、灰坑、沟为主;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玉器、骨角器及蚌器等,还出土了玉器半成品。

旧石器时代遗存 遗址出土打制石制品十分丰富,器型多样,以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最具特色,既有石片工具,也有砾石工具。石料以石英岩为主,有盘状石核,另有大量石片、断块、碎屑。从石器原料、剥片技术、修理技术、石核类型、工具组合来看,符合旧石器时代技术特征。该发现为探讨庙岛群岛史前人类历史、环境变迁以及人群在海岸变迁过程中资源利用、环境适应策略等提供了新的线索。

大汶口文化聚落 东村遗址发现4座房址,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东南部,房址整体形制较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椭圆形,布局有序,似有功能分区。

F1位于南侧,半地穴式,地面可见柱洞遗迹,地面铺垫细沙或经火烤硬化,部分残留红烧土垫面,反映出大汶口先民对海岛微环境的精细适应—小型半地穴设计既可防风风侵袭,又利于防寒保暖;细沙铺垫与红烧土面则兼顾防潮与保温,这为深入研究海岛地区史前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聚落材料。F2位于东侧,房址内出土玉器,或与玉器制作有关。

遗址出土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同一陶片上有红色或黑色斑块,陶质有掺细砂、云母或滑石粉等。陶片以素面为主,有少量附加堆纹;器型多见罐、鼎、盆等,与大黑山岛北庄文化一期特征相似,同时亦见少量刻划纹圆形罐陶片和彩绘红陶片,印证了跨海文化交流的持续性

与复杂性。

大汶口文化遗存样本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400~4800年。这一时间序列印证了庙岛群岛作为海陆交汇枢纽的长期延续性。

大汶口玉器加工制作生产要素 遗址出土20余件玉料,多为透闪石质,色泽青绿或灰白;器类包括边角废料、半成品和玉器,伴出砺石、磨石等加工制作工具。玉料、半成品、玉器及制玉工具等玉器制作要素的同时发现,证明该遗址存在玉器生产业,这一完整制玉链表明东村遗址并非单纯玉器消费地,而是具备自主设计、选料、切割、钻孔、打磨能力的区域性生产中心。这是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制作地区的首次发现,为探索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玉器交流路线、庙岛群岛在史前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及机制提供了新视野。

学术价值与意义

第一,东村遗址的发掘为庙岛群岛史前文化序列构建提供了新的实证,补充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海洋性考古学术化的资料。

第二,本次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将庙岛群岛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至距今1万年以上,证实该群岛在末次冰期后海平面波动剧烈时期仍为人类持续栖居与迁徙的重要廊道。

第三,大汶口时期玉器制作要素的发现,是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制作研究的新突破,不仅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玉器来源的重要路径,更将庙岛群岛纳入东北亚史前玉器流通网络的核心节点,凸显其作为海陆文化中转站的独特地位,证实海岛聚落具备高等级手工业生产能力。

第四,透闪石玉料的溯源分析已初步指向辽东半岛,印证了跨渤海湾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组织水平。这一跨海资源网络的形成,暗示着距今5000年前庙岛群岛已存在稳定的航海技术、季节性航行知识及跨区域协作机制;玉器成品在胶东乃至环黄渤海地区的广泛分布,进一步佐证了以海岛为支点的文化辐射力。

此次考古收获,证实庙岛群岛并非文化边缘的“孤岛”,而是史前海陆互动的关键枢纽,万年前的打制石器与五千多年前的玉器制作,共同勾勒人类逐海而居、因势而作的绵长轨迹;这些发现为探讨庙岛群岛人类活动的起源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实证,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人类史与海洋史早期演进路径提供了线索资料。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古笑雷 孙倩倩 孙田璐 高明奎)

陕西渭南市旧石器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成果

渭南市位于关中平原东部,为陕北黄土高原与秦岭的连接部位,地势以渭河为轴线,地貌呈现南北两山、两塬、中部平川五大地貌类型区。境内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两大河流,渭河自西向东贯穿中部核心区,在潼关汇入黄河。渭河以南有发源于秦岭、并行汇入渭河的潼河、赤水河、沈河、零河等多条一级支流。渭河北有发源于陕北榆林定边县与铜川北山的北洛河和石川河等一级支流,渭河及其支流两岸水热条件适宜,自然资源丰富,均为适宜古人类生活的区域。距今256万年前的第四纪以来,关中平原南北两侧的秦岭迎风坡地带和黄土高原与渭河平川过渡地带发育有非常典型、清晰而完整的黄土—古土壤地层堆积序列。

渭南市的旧石器考古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在配合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在潼关县发现旧石器遗址,在大荔县沙苑地区发现晚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之交的细石器遗物。60年代,在时任渭南辖区的蓝田县,闻名于世的陈家窝直立人下颌骨和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化石相继出土。70年代后期,则有著名的“大荔人”化石发现。2019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渭南市博物馆联合组队,重启渭南旧石器考古工作。经过数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在渭南市境内连续发现旧石器遗址100余处。这些新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河以南秦岭北麓地区的潼关、华阴、华县、临渭等区县,渭河以北石川河流域的富平县,北洛河流域的蒲城、澄城和白水等县。

秦岭北麓发现的旧石器

2019年以来,调查队对渭河南侧发源于秦岭的一级支流潼河、白龙洞、遇仙河、赤水河、沈河、零河逐次展开调查,在这些河流的两岸新发现旧石器遗址60余处。从调查的情况分析,秦岭北麓的旧石器遗存绝大多数埋藏于渭河南侧南—北向流淌的支流两岸第四纪黄土—古土壤地层中。根据暴露的地层剖面,比对黄土高原经典的洛川、渭南等黄土堆积地层序列,配合光释光地层绝对测年数据,基本可以断定调查时在地层剖面采集的石制品多来自距今约50万年前后的第5条古土壤(即“红三条”)以来的各黄土—古土壤地



蒲城县境内北洛河三级阶地砂砾层发现的石制品

层中,其中又以第2条和第1条古土壤层发现的石制品最为丰富,据此可以判断调查所获石制品的年代为距今50万年到3万年之间。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石片、修理工具和断块碎屑等,其中工具类型有砍砸器、薄刃斧、手镐、不同尺寸的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等。加工石制品的原料以石英、石英岩为主,少量石英砂岩、花岗岩等。另外,在个别遗址采集到与石器伴存的烧石以及鹿、牛等哺乳动物化石。

渭河以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

2020年以来,调查队在关中平原北侧渭北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过渡地带的北洛河下游和石川河流域新发现遗址点近50处。其中在石川河及其支流温泉水流域的富平县新发现旧石器遗址14处。石川河流域的石制品主要埋藏于黄土—古土壤序列地层的S₅古土壤层至L₅黄土层之中。在庙沟等諸多遗址,从连续而完整的黄土地层序列中采集到丰富的旧石器制品。石川河流域的石制品原料以质地上乘的石英、石英岩为主,另有少量石英砂岩等。石制品类型包含石锤、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碎屑。工具包括砍砸器、手镐、手斧、多样化的刮削器、缺口器、锯齿刃器、石钻、尖状器和雕刻器等。2022年至2024年,考古团队对时代较晚的富平县朱黄堡遗址进行发

掘,出土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小型石核—石片工业技术的石器组合,并首次在渭北地区发现了原位埋藏的手斧等重要遗物,这些发现填补了渭北中部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的空白,在国内旧石器考古学界产生较大的反响。

此外,调查队在渭河支流北洛河流域同样发现了埋藏于黄土—古土壤地层的石制品。从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渭北黄土高原到关中平原过渡地带的旧石器遗存非常丰富。根据遗址黄土—古土壤地层堆积序列以及石制品技术特点,初步判断该区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从距今60多万年延续至5万年前后,该时段为中更新世气候转型完成之后(120~60万年)人类演化和石器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段,这些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渭北地区60多万年以来人类对环境适应过程的科学资料,为未来进一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调查中还在北洛河流域白水县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细石器文化遗物,这是首次在北洛河流域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年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为进一步在渭北地区探寻细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除此之外,调查中还在北洛河两岸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阶地砂砾层中新发现多处遗址,其中第三级阶地砂砾层与大荔人化石出土地层相当,年代距今约30~25万年,而更高的阶地砂砾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年代可能更早。

综上所述,渭南市旧石器考古调查的重要新发现填补了不少区县旧石器遗存发现的空白,使渭南市的旧石器考古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刷新和深化了学术界对该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和文化特征的认识。秦岭北麓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埋藏地层展示了百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和旧石器工业发展演化的历史。渭北台塬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不晚于距今60万年,其中北洛河为古人类自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北部通往关盆地的主要迁徙通道,保存了近百万年以来古人类生存与迁徙信息。所有这些众多的旧石器遗址和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展现了古人类在这些地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历史画卷,也为进一步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生存演化史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证据。

(渭南市博物馆 执笔:景玉薇)

2025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弥勒市博物馆等单位对云南省弥勒市散坡村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散坡村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西三镇散坡村西北,“散坡”用彝族撒尼和彝族阿细语讲就是“止咯波”,汉语字面意思:铜石山、铜矿山,暗示着该地悠久的铜矿资源历史。

此次散坡村墓地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61处,包括50座土坑墓、1座房址、1处用火遗迹及9个灰坑,出土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石器等各类器物320余件(套)。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器型丰富,涵盖斧、钼、釜、釜、带钩、鐎、鐎于、铃及车马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大部分墓葬的随葬品中发现了高品位的铜矿石,甚至部分铜釜内装有高品位铜矿石,这一现象在国内同期遗存中极为罕见。

考古发掘的墓葬形制多为小型土坑墓,随葬品以实用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为主,最常见组合为铜钼、铜斧和铜釜。其中一座墓葬(M3)出土随葬品达30多件。一个独特的葬俗是,随葬品多集中放置于墓底一端的“足坑”内,此为云南青铜时代考古的首次发现。此外,墓地还出土了铜鐎于、铜钼、羊首铜扣饰等云南地区罕见的器物,文化面貌呈现出多种青铜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

综合墓葬特征、出土器物及周边环境,初步判定散坡村青铜墓地年代属两汉时期,墓主人很可能为当时从事铜矿开采与冶炼的工匠。其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散坡村附近就发现了宝源厂、凤凰厂、小新厂、磨下地等多处铜矿的采矿和冶炼的遗存,规模都比较大、有人工开采的矿洞,也有成片的冶炼堆积矿渣,这些遗存的年代大致在明朝初期至清中晚期,也不排除更早的可能。说明最迟至明代早期,这里已经存在有与矿产资源相关的开采利用的社会形态了,也印证了散坡村墓地周边矿产资源开采利用历史久远。

综合发掘成果,再结合与周边青铜时代墓地的比较判断,散坡村青铜墓地年代为两汉时代(绝对年代在测年中),遗存内涵反映出鲜明的多种青铜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墓地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墓葬中随葬高品位的铜矿石现象,其出土器物组合与随葬铜矿石的独特习俗,在国内同时代的同类型遗存中罕见。墓葬主要为小型土坑墓,随葬品以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为主,墓地周边铜矿矿产资源丰富,再结合周边调勘发现的红烧土、炼渣、矿洞、夹砂陶片等,推测墓主人为开采矿产资源的矿工。墓地是一处青铜时代的工匠墓地,这是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首处。揭示了汉代西南地区矿工群体的丧葬习俗与文化面貌,丰富了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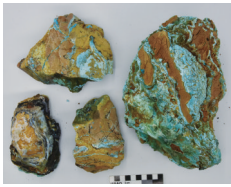
第二,墓地所处区域自然环境不佳,但矿产资源特别是铜矿极为丰富,墓地也反映出较强的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信息。结合发掘期间,在周边龙王庙山遗存点发现的红烧土、炼渣、夹砂陶片、同心圆纹盘等,以墓地为中心的区域对研究青铜冶炼技术,特别是滇文化青铜器的原料来源、冶炼技术与资源流通路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有望揭开古代西南地区青铜文明背后的资源密码。

第三,散坡村墓地位于滇东南腹地,处于交汇地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特点,如车马器构件与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相同、玉珎与石寨山墓地相似、铜釜与个旧黑玛井墓地的相近,还出土有巴蜀地区常见的铜鐎于,夜郎文化常见的镂空带柄铜剑等,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鲜明见证。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或者人员迁徙,使得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共同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云南青铜文化。

关于其族属方面,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的记载,再结合其地理位置、地处弥勒、路南(石林)、泸西、陆良、师宗等交汇区域,墓葬亦有分布于石头之中等特点,初步推测该墓地属于西南夷之漏卧遗存,当然其西距滇文化分布地澄江较近,周边又出土有滇文化常见的同心圆纹盘,也不排除其为滇文化的某种地方类型可能。

古代文献《汉书·地理志》记载:“律高县(现弥勒市),西面‘石空山,出锡’。”这清晰地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当地就已经在对青铜器的重要原料进行规模化开采和冶炼。通过此次考古发掘,除了散坡村墓葬外,在周边还发现了多处古代冶炼遗址,种种迹象表明散坡村极有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上记载的“石空山”所在地。其实在红河州境内,不只是散坡村墓地体现出浓郁的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讯息,在世界锡都个旧发掘的黑玛井墓地,也是一处与矿产资源开采相关的汉代墓葬,墓葬等级很高,出土了铜孔雀灯、三枝俑灯等,只不过墓主人是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者。此外,在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龙胜河遗址,考古工作者则发现了目前西南地区最早的铜矿资源冶炼铸造的证据,发现大量的地穴式炼炉、炼渣及各种质地的铸范,遗址距今年代3600年。红河州的这些考古发掘成果,不仅生动展现了云南地区发达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铜矿业的开采、冶炼及铸造等景象,各类考古遗存也体现出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历史,实证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悠久历史。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胡长城 徐怀立 杨德辉 朱云生)



M12:4铜矿石



M28:8铜釜



铜钼



M1:1铜釜



羊首铜扣饰



M28:10铜钼



墓底放置高品位铜矿石

五至八版责编:张 硕 张 宸 张梓杰

西南地区首次确认的青铜时代工匠墓地